

诗学

中国艺术美学 与文化诗学论稿

何世剑◎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014034809

J01-53
05

中国艺术美学

与

文化诗学论稿



何世剑◎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北航

C1722639

J01-53
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艺术美学与文化诗学论稿 / 何世剑著.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210-06287-5

I. ①中… II. ①何… III. ①艺术美学—中国—文集
②古典诗歌—诗歌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J01-53
②1207.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5557 号

中国艺术美学与文化诗学论稿

作者:何世剑

责任编辑 周伟平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编辑部电话:0791-86898054

发行部电话:0791-86898893

邮编:330006

网址:www.jxp-ph.com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25

字数:480 千

ISBN 978-7-210-06287-5

赣版权登字-01-2013-44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价:39.80 元

承印厂: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中国艺术美学与文化诗学论稿

导论 /1

上 编

中国艺术美学研究

1. 试论中国古典音乐批评的“生态和美”观及其当代意义 /19
2. 《魏书·乐志》、《刘子·辩乐》与北朝乐舞艺术批评 /37
3. 弋阳腔音乐美学三论 /49
4. 中国书法美学视野中的书“媚”论 /58
5. 中国书法美学视野中的书“韵”论 /69
6. 论书法美学尚“趣”思想的历史嬗变 /80
7. 试论中国书法“源流批评”的逻辑进程与多维形态 /90
8. 中国绘画美学视野中的画“媚”论 /101
9. 中国绘画美学视野中的画“趣”论 /112
10. 魏晋南北朝的建筑园林艺术批评 /123
11. 中国古典美学“丽”范畴的源起与嬗变 /155
12. 试论古典美学“丽”范畴的审美内涵及美学特征 /165
13. 新时期以来古典美学“丽”范畴研究述评 /176
14. 新时期以来“艺术批评学”研究综论 /184

下 编

中国文化诗学研究

1. 先秦两汉时期诗学人格批评论 /203
2. 中国古代诗学批评中的诗“媚”论 /212
3. 中国古代词学批评中的词“媚”论 /221
4. 《文心雕龙·情采》篇旨新释 /231
5. 试论唐代诗词视野中的唐代妇女文化观 /240
6. 李商隐诗歌中“灯烛”意象的文化意蕴 /249
7. 试论汤显祖的戏曲批评思想 /258
8. 中国古典戏曲理论批评视野中的曲“丽”论 /270
9. 明代戏曲理论批评视野中的“弋阳腔” /283
10. 试论弋阳腔文学视野中的“包公戏”及清官崇拜 /295
11. 公案小说之演进与清官文化传播 /306
12. 公案小说思想分野与清官文化构建表现 /315
13. 公案小说的精神风尚与清官文化的美学质性 /326
14. 公案小说的世俗品格与清官文化的民间情怀 /336
15. 试论朱庭珍《筱园诗话》之“诗法”说 /345
16. 朱庭珍“杜诗学”综论 /354
17. 论朱庭珍对严羽诗学的接受 /367
18. 新时期以来古代文论“情理”范畴研究综论 /377

主要参考书目 /387

后记 /391

导 论

中国古代文论、艺术美学思想始终是当代文艺学、艺术学建设的重要的理论资源,它的内在精神、血脉和品格并没有断裂,而是内在地、逻辑地承传融汇到了当代文艺学、艺术学之中,并在深层次领域影响了当代文艺学、艺术学的发展路径和建设格局。正如魏收《魏书·文苑传序》中所云:“文质推移,与时俱化。”我们在文化建设中进行表达、沟通和解读所使用的话语、运思的方式,实际上已经随着社会的发展变革,一定意义上实现了现代转换和创化,具有了新的内涵和时代特质。虽然它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理论话语的冲击和牵制,但并没有被消解和取缔,而是以其巨大的熔铸能力、创化能力,在借鉴、吸纳的基础上杂糅、融汇了西方文论思想、方法和话语,最终悄然地实现了综合创生。

当然,在中国古代文论、艺术美学思想资源的检视、整理和创化方面,我们还做得非常不够。之所以出现“失语”的现实危机和“西化”的潜在可能,不是我们的古代文论、艺术美学思想资源在当下缺乏生存“土壤”和行销“市场”,注定了要成为时代的“弃儿”,而是我们挖掘、认识的不够。历史经验已然证明,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本身就有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它的每一轮发展都以其包容性、创化力而具有了时代特性和品格。就如中国诗学“意境”论,它既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它的文化内涵和美学属性也是不断丰富的,对于今天的文艺学、艺术学建设来说,它依然有着重要的思想价值和学术意义。与时俱进地开展古代文论、古典艺术美学研究,反思和清理传统文论、美学资源,从中国文论、美学的基本材料出发,抓住一些重要的范畴、概念和命题从历时与共时统一的视角去探寻其内在的联系,找出之中固有的规律,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国传统文论的潜在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历史形态。回应“失语症”的焦虑,走出“断裂论”的窠臼,在古代文论、美学的现代转换中,我们有必要走一条古今学术资源的“对话”、“融合”、“创生”之路。



马克思曾经说过：“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①列宁在《哲学笔记·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曾经形象地指出，“思维的范畴不是人的用具，而是自然和人的规律性表述。……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梯级，即认识世界过程中的梯段，是帮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②。可见，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范畴是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联系的思维形式，是各个知识领域中的基本概念。马克思主义者非常重视语言和范畴的研究，来推进对人类思想、历史发展变化的逻辑认识和精细把握。

叶朗先生曾指出：“审美现象是一种文化现象。不同的文化圈曾经发育了自己的审美文化。每一种审美文化都有自己的独特形态。不同的审美文化之间有着因文化的价值取向、最终关切的不同而带来的重大区别。如果说，艺术风格反映了不同艺术的意象的性格，那么，审美范畴则是文化的‘基本意象’的风格。”又说：“美学史就应该研究每个时代的表现为理论形态的审美意识。每个时代的审美意识，总是集中地表现在每个时代的一些大思想家的美学思想中。而这些大思想家的美学思想，又往往凝聚、结晶为若干美学范畴和美学命题。美学范畴和美学命题是一个时代的审美意识的理论结晶。……一部美学史，主要就是美学范畴、美学命题的产生、发展、转化的历史。因此，我们写中国美学史，应该着重研究每个历史时期出现的美学范畴和美学命题。这样做，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国古典美学的体系及其特点，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国美学史的主要线索及其发展规律，从而使历史和逻辑统一起来。”^③叶朗先生非常重视美学范畴、命题的研究，他倡导承继前人的思想精髓、学术理路“接着讲”，他将这种研究意识和治学理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74.

② 列宁.哲学笔记·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M].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75、78.

③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4.

贯彻于他的美学史研究与写作始终,为我们后来的艺术美学研究提供了范式和榜样。

新时期以来,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很多较核心的范畴作了深入的研究,如“志”、“情”、“象”、“境”、“神”、“和”、“道”、“气”、“兴”、“味”、“韵”、“势”、“格”、“趣”、“清”、“文质”、“风骨”、“自然”、“雄浑”、“沉郁”、“冲淡”、“体性”、“虚实”、“妙悟”、“性灵”等等。仅以出版的论著言,代表性的就有曾祖荫《中国古代美学范畴》,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文质彬彬》,吴调公《神韵论》,张海明《经与纬的交结》,袁济喜《和:审美理想之维》、《兴:艺术生命的激活》,赵沛霖《兴的源起》,詹福瑞《中古文学理论范畴》,涂光社《势与中国艺术》,汪涌豪《风骨论》、《范畴论》,蓝华增《说意境》,刘九洲《艺术意境概论》,蒲震元《中国艺术意境论》,薛富兴《东方神韵——意境论》,王文生《论情境》,等等。就大型的丛书而言,蔡仲翔、陈良运两位先生主持编纂的《中国美学范畴丛书》,系统考索、整理和研究了二三十个审美范畴,为我们认识中国古典美学的丰富多样、浩瀚精深提供了范本和参照。而在一些美学文献资料的整理书籍中,也展开了对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的逻辑梳理和提要解析,如胡经之先生主编的《中国古典美学丛编》,全书分为三编,“围绕着创作—作品—鉴赏这三个环节展开”,在每一范畴下,先作一提要说明,解析这一范畴的基本涵义及其发展历史,然后按历史顺序排列整理资料。胡经之先生后来主编的《中国古典文艺学丛编》沿袭了这一路径。而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的《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侯镜昶主编的《中国美学史资料类编·书法美学卷》、吴调公主编的《中国美学史资料类编·文学美学卷》、徐中玉主编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王振复主编的《中国美学重要文本提要》、叶朗总主编的《中国历代美学文库》等,则为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文献资料。

正如蔡仲翔、陈良运两位先生在《中国美学范畴丛书》序中所指出的:中国传统美学范畴存有“多义性和模糊性”、“传承性和变异性”、“通贯性和互渗性”、“直觉性和整体性”、“灵活性和随意性”等特点,这些特性成为研究中的难点,另外古今思维方式的差异也增加了研究的难度。但是辩证地看,研究的不易本身又预示着对这片未知领域探索的神秘性和兴趣感,它激励着我们在其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只有推进了这项研究,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古代文论、古典美学的现代转换,才能切实解决古代文论、古典美学研究中的当代性问题,推进其

与当代文论、西方文论的密切融合。钱中文先生在1992年11月文学理论研讨会上曾发言指出:“古代文论蕴含十分丰富,关于文学、创作动因、心理、鉴赏、批评、接受等方面,有它自己的一套主张,如何清理出古代文论中的一些至今具有生命力的系列概念,使其获得大致公认的共识,使这些具有独创性的范畴与当今没有被简单化的文学理论融合起来,整合成一个既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传统范畴又具科学性的当代形态的文艺理论体系,这是令人十分向往的事。”^①将经历了千百年的历史积淀,目前还依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的古代文论、古典美学中的观念、范畴加以研究和激活,使其在与当代文论的新型对话中焕发新的生命活力,最终建设起具有民族特色的新的文艺理论形态,成为了我们探索的目标和动力。

我承继前人加入了这一研究大潮,从两个方面做了尝试和努力,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认知和思考,主要体现在本书上编内容《中国艺术美学研究》之中。

一方面,试图就前人研究甚少的一些美学范畴进行系统化研究,考索其渊源流变,把握其美学内涵和特性。如古典美学“丽”范畴的研究,我采用历时性与共时性研究相统一原则,从纵向的历史沿革与横向的逻辑结构两个视角,对这一范畴作了较全面而系统的考察,将“丽”作历史的还原、美学的还原、文化的还原,系统探讨“丽”范畴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轨迹,并对“丽”范畴理论内涵及相关的理论问题作出论述,主要通过研究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唐宋时期、元明清时期中散文、骚赋、诗词、戏曲、书法、绘画、音乐的尚“丽”意识和“丽”化观念,从感性显现和理性规范两个维度描述了各个时期“丽”审美风尚的承继和嬗变,考察了受中国传统儒、道、骚、禅思想深刻影响下的“丽”表现出的尚和谐、自然、绮靡、清淡等美学内涵和特征。无论是从“丽”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感性显现,还是它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理性规范来讲,我都认为“丽”应该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核心范畴,它在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系统中应该有一席之地,并且应该处于较高的位置。这既是历史文化大语境所赋予的,也是由它那独特的美学本体属性和审美意义所决定的。

另一方面,针对前人已有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新的思考,特别是将其拓展到大艺术、大审美文化的宽广视域中进行把握,立足于专题研究,使之在材料和立

^① 钱中文.文学理论:回顾与展望[C].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8.

论方面有所完善。如《试论中国古典音乐批评的“生态和美”观及其当代意义》一文,考察了中国古典音乐批评的“生态和美”观的历史源起、逻辑发展和文化内涵。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古典音乐批评较早就寓有“生态美学”视角,它体现在古人品音乐时有着持续而强烈的生态关怀的意识,从“大生态”、“整体生态”和谐的视角来思考和把握音乐与自然、社会、人生及音乐自身的关系。他们不仅在音乐艺术本体特性的论析中秉持一种“生态和美”观念,而且将音乐与自然生态、社会形态及人生世态密切联系,认识到音乐艺术具有与自然万物、社会人事、人生形态异质同构的特性,在“去同取和”“以和为美”方面是相通的、一致的,这是一种大生态视野的“和美”观念。经过后世的不断积淀,中国古典音乐批评思想遗产中累积了丰富的“生态和美”观念,成为中华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生态文化”“生态文明”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文化发展繁荣依然有现实意义。其他如对古典艺术美学范畴“媚”、“趣”、“韵”等研究,也尽可能在书法、绘画、乐舞乃至建筑园林艺术等层面展开考索,显现出这些范畴的历史形态、美学品性和文化内涵,以期丰富我们对之的综合认识。

二

中国“文化诗学”,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理论学界针对现实文化存在状况问题(其中特别是消费主义文化的迅猛发展问题及引发的文学研究的“泛文化转向”、文学理论学科危机问题)进行回应、反思和解析所提出的一种理论范式,在新时期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重大影响。“文化诗学”在探讨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时,力主把“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贯通起来,既重视文本作品的语言美属性(诗性),也重视文本的文化精神蕴含,试图从文学的诗情画意和文化蕴含的结合部来开拓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园地。

作为中国式“文化诗学”研究的倡导者和旗手,童庆炳先生指出:“文化诗学的基本诉求是通过对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的文化解析,提倡深度的精神文化,提倡人文关怀,提倡诗意的追求,批判社会文化中一切浅薄、庸俗、丑恶、不顾廉耻和反文化的东西。深度的精神文化,应该是本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与世界的优秀文化的一种交融的产物,它追求意义和价值。这种深度的精神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它的人文品格,即以人为本,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保证人的心理的

健康,关怀人的情感的世界,促进人的感性、知性和理性的全面的发展。”^①又说:“文化诗学的旨趣首先在它是诗学的,也即它是审美的,是主张诗情画意的,不是反诗意的,非诗意的,它的对象仍然是文学艺术作品,而不是流行的带有消费主义倾向的大众文化作品,不是什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不是‘街心花园’,不是‘模特走步’。……它的研究和批评的视野是文化的。”^②在《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总序中,他又强调了文化诗学研究的五个基本原则:历史优先原则、对话原则、自洽原则、联系现实问题原则、诗意的追求原则。其中历史优先原则,强调我们的研究必须把问题放置到原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把握。对话原则,强调古今对话、中西对话、主体间平等对话、主客体真实对话。自洽原则,强调研究应该在观点和方法上一以贯之,逻辑上能自洽而圆通。联系现实问题原则,强调从现实问题出发,通过研究,提炼出某种文化精神或诗性精神来。这种文化精神或诗性精神正好是现实所缺失的东西,因此我们通过文化诗学所获得的成果可以弥补现实的不足,是对现实的一种回馈。诗意的追求原则,强调文化视角无论如何不要摒弃诗意视角,我们要文化,但也要诗意、语言等等。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是文学艺术的诗情画意的守望者。童庆炳先生立足于中国国情,把握文学、文化、诗学发展演变历史,着眼于当下现实问题的思考,通过交流对话和融通自洽等方式,走出了一条具有学术生长意义和学科建构价值的文学理论研究重建之路。他所提出的关于文化诗学研究的基本诉求、理论旨趣和系列基本原则,成为了我们文艺理论领域学理研究和批评实践的重要标尺和向度。

在童庆炳先生的鼓呼下,程正民、蒋述卓、李青春、王一川、刘庆璋、林继中、赵敏俐、顾祖钊、王岳川、盛宁、张未民、周平远、刘士林、陶水平、李圣传、李茂民、田忠辉、赵勇、邱运华、陈太胜、藏策、王进、张进、祖国颂等一大批学者纷纷加入进来,他们着眼于当代中国国情,以理论工作者大无畏的思辨精神、批评意识和求真务实理念展开研究,回应和解答了当下社会、文化现实中出现的种种新问题、新变化,从语言、文化与审美深度融合的视野中去认识、把握和研究这些新的现象,纠正了现实社会文化中的精神缺失、文化畸形、人文异化、道德失范、社会

① 童庆炳.“文化诗学”作为文学理论的新构想[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6.

② 童庆炳.“文化诗学”作为文学理论的新构想[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6.

无序、价值失衡等状态,引导社会文化朝着有利于人的和谐、健康发展的好的方面进化。其中,“文化诗学”中国化、本土化的资源梳理、学术反思和理论建构,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1)对“中国文化诗学”的定位、定性研究。蒋述卓、李青春、顾祖钊、刘庆璋、李圣传等学者在理论建构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如李青春先生指出:“‘中国文化诗学’是指中国古今学人根据中国文学作品与相关文学现象的特征而形成的,从具体社会文化角度对文学现象进行理解与阐释的研究路向。”^①这种方法是“将阐释对象置于更大的文化学术系统中进行考察。就古代文论而言,要将文论话语视为某种整体性文化观念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因此在考察其发生发展及其基本特征时能够时时注意到整体性文化观念所起到的巨大作用”^②。(2)用“文化诗学”理论、视角来检讨中国文学经典文本。林继中、王一川、陈旭光、陶水平等人都有重要论文。他们借助于综合的整体性眼光,返归文学文本之中,从历史文化与精神的众多层面来研究、透视文本中的精神蕴含、文化符码。(3)用“文化诗学”方法对古代传统诗学命题、范畴、经典作家、理论家思想等予以新的阐释。如黄曼君、欧阳文风、林继中、蔡镇楚、藏策、黄健、侯敏、菅国坤、张宝、杨庆杰、李艳丰、高蕊、纪燕、张晓丽等学者的研究,激活了中国古代文论资源的话语功能、诗性力量和精神蕴涵,在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中实现了拓展研究。拙著所进行的一些研究尝试和学术努力,也正是在这一语境中展开的。

第一,强调对古代文化诗学的精神蕴涵、人文品格等进行专题学术探讨。

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正是由于它而不是由于我们所无法填充的空间和时间,我们才必须提高自己。因此,我们要努力好好地思想,这就是道德的原则。”人之所以可贵和重要,就在于他富有思想,思想能助他超越现实困顿和平凡人生,去探索浩瀚的未知时空。思想、精神的蕴涵及其

① 李青春.中国文化诗学的源流与走向[J].河北学刊,2011(1):83.

② 李青春.文化诗学视野中的古代文论研究[J].文学评论,2001(6):46.

韧性、力度,具有丰富的美感和无穷的魅力。古往今来,人们对于精神问题的思考总是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黑格尔曾说:“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骛于外界,而不遑回到内心,转向自身,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精神家园中。”黑格尔对精神哲学的迷恋和探索,创建了精神现象学。专门从精神价值方面对中国艺术、美学、诗学等进行著论的有徐复观先生的《中国艺术精神》、潘知常先生的《中国美学精神》、胡晓明先生的《中国诗学精神》、袁济喜先生的《中国古代文论精神》等,这些论著在通史性、系统化研究方面用力甚勤,取得了丰硕成绩,在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也促发了学界关注精神价值问题的研究。当然,相比于范畴、命题及观念的研究而言,内在精神意蕴问题的研究容易流于抽象,难以言说。但是中国古人对于精神价值的推崇却是无以复加的,即如《老子》中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即指形而上的精神价值,器则是指具体的器物与运用,长久以来,在中国人的意识领域中自觉积淀、形成了“重道轻器”的传统,道与器、道与技的体用、本末关系十分的明了,也贯彻了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批评的始终。刘勰的《文心雕龙》、严羽的《沧浪诗话》、王夫之的《姜斋诗话》、叶燮的《原诗》等著作乃至金圣叹的小说评点、李渔的戏剧理论等,这一思想观念都显现得很明确。可见,中国古代文论发展的生命力就在于其深度的精神蕴涵。精神之光,穿越古今,烛照人生,超越了生命悲剧,推动了中国文艺创作及批评的发达。

宗白华在1919年11月15日出版的《少年中国》第1卷第5期上撰文《中国青年的奋斗生活与创造生活》中呼吁:“我们现在对于中国精神文化的责任,就是一方面保存中国旧文化中不可磨灭的伟大庄严的精神,发挥而重光之,一方面吸取西方新文化的菁华,渗合融化,在东西两种文化总汇基础上建造一种更高尚更灿烂的新文化作为世界未来文化的模范,免去现在东西两方文化的缺点、偏处。这是我们中国新学者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并且也是中国学者应负的责任。因为现在东西文化都有缺憾,是人人晓得的,将来世界新文化一定是融合两种文化的优点而加之新创造的。这融合东西文化的事业以中国人最相宜,因为中国人吸取西方新文化以融合东方比欧洲人采撷东方旧文化以融合西方,较为容易。”^①宗白华先生在上世纪初,站在“融合东西文化事业”的高度,强调我们应该研究、

^① 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1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102.

保存和发扬“精神文化”之光,这是我们中国学者应负的责任。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与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曾说:“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同时指出:“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毛泽东同志一向强调研究民族文化精神,为新型社会、文化建设输送学理资源。立足于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今人与古人对话,东、西方对话,仍然不能放弃从精神人格层面去体验古人,认识古人及传承其意蕴。立足于当代的人文导向与人文关怀,整理和发掘中国古代文化诗学原始文献中潜蕴的人格精神、人文精神内涵,作出现代理论阐释是必要的。正是沿着这一路径,拙著着力考察了先秦两汉时期诗学的人格批评论嬗变及表现,批判式地检讨了中国诗学中的“媚”观念,探索了《文心雕龙·情采篇》中“真宰弗存,翩其反矣”的人文精神蕴涵,爬梳了中国古代“灯烛”意象所积淀的“燃烧自己,烛照他人”精神及“时光易逝,韶华难期”的人生忧患意识,把握了风雨飘摇之际以诗自励、崇尚诗法的朱庭珍的“积理养气”说及他对杜甫、严羽诗学中“诗品出于人品”、“自家实证实悟”、“别铸真我”主观精神的接受。特别是沉潜入小说、戏曲中,发掘了中国文化的“清官崇拜”意识和尚“清”精神。通过这些专题研究和文化解析,力图发掘和显现中华民族文化诗学中的优秀精神传统,为当代文艺学建设提供一定的思想学养和精神资源。

第二,尝试着从中国传统文学、诗学、文化中整理资源,为建构本土化“中国文化诗学”提供一定的学理支持。

中国古代文论的蕴涵十分丰富,在创作、鉴赏、批评、接受等诸多方面都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学术话语、理论范畴及命题,这些知识和学养都是我们古人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发挥其思想智慧来解析社会文化发展问题时所凝结、积淀形成的。杨杏佛先生曾说:“每一个时代都各有其时代的大精神,艺术家如果不能把握这个大精神,便不能使艺术的生命与时代的生命合流。”强调了艺术家对时代的敏感力和担当精神。袁济喜先生在《新编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中说:“中国古代的文论家首先是充满人文忧患意识的思想家,他们往往是站在时代的前列与人生的尖峰上来考察文学现象,回应文学与文化建设中出现的严峻问题,建构自己的文学思想与美学理论的。”^①是的,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在礼崩乐坏的

① 袁济喜,《新编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

社会文化转型时期,往往能够挺身而出,振臂疾呼,高声呐喊,以文笔为武器去战斗,试图力挽狂澜。他们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古往今来,中国文论中出现了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屈原的“发愤以抒情”,司马迁的“发愤以著书”,庾信的“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韩愈的“不平则鸣”,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均能见出我们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文忧思、关怀和文化担当。通过运用“文化诗学”新的思想观念和方法对之进行爬梳、整理及分析、阐释,能够有助于我们当代文论体系建设,这也是我们把握现实问题,寻求解答问题的学术资源和方法的一种自觉努力。赵勇在《“文化诗学”的两个轮子》一文中指出:“文化诗学表面上似乎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但在其背后,实际上却隐含着人文知识分子对中国现实境况的一种回应,也反映出他们走出书斋,关注现实,参与社会的理性思考,其中的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①在赵勇看来,“现实性品格”与“审美性品格”是“文化诗学”这架战车上的两个轮子,两者并行不悖,缺一不可。前者保证了“文化诗学”的胆识、锋芒和锐气,保证了“人文关怀”不再是坐而论道,夸夸其谈,从而也保证了文学理论与社会现实的直接关联,文学理论家因此拥有了向现实发言的特殊话语渠道;后者保证了“文化诗学”的诗意空间,保证了文学理论的学科品格,从而也保证了文学理论与文学话语圈的直接联系。^②其实,在中国这样一个诗歌的国度中,着眼于诗学问题所生发的文艺理论批评又有哪些缺失了“诗性”、“审美性”品格呢?如“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不畏权豪怒,亦任亲朋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等等,哪些不是着眼于文艺与现实社会关系问题思考而展开呢?

梁启超先生曾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将“史的目的”概括为“予以新意义”、“予以新价值”、“供吾人活动之资鉴”。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就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中国文论的“现代性”问题、中国文论话语的“当代重建”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问题的实质是重新认识、评价中国古代文论作为国家、民族的思想资源在当代文学、文艺、文化建设中的生成可能、阐释空间和理论意义。中国“文化诗学”的研究,同样也是如此。中国古典“文化诗学”、艺术美学中

① 赵勇.“文化诗学”的两个轮子[J].江西社会科学,2004(6):34.

② 赵勇.“文化诗学”的两个轮子[J].江西社会科学,2004(6):38.

积淀有丰富的文化、美学精神资源,在当今社会文化转型时期,我们如果能够对之加以检视和整理,则能为我们提供精神养分和思想智慧。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大众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日益提高。但是当今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又呈现出较大的不平衡,人的内心生活世界也在快节奏、高强度的社会竞争压力之下往往表现为失衡、紊乱状态,此外,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也在工业化的社会建设中日益紧张、冲突。物欲横流、沉渣泛起,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文化喧嚣尘上,成为了当今时代的一种文化表征和症候。在这样一种社会经济文化语境中,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更加需要有思想智慧和方法来化解这些危机和矛盾。立足当下现实状况,回归古代经典历史文献中去寻求资源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经典的文化知识,是我们古人生命智慧的思想结晶。牟宗三先生曾说,古代真人、圣人的学问都是他们真实生命的集中体现,都是进到了生命的核心里面去了的。他在《生命的学问》一书中指出:“真人圣人是要收归到自己的真实生命上来在永恒的过程中显示”,“不是自己生命所在的地方,就没有真学问出现”,又说:“我们人类的文化的恒久累积,就是靠着每一个人把生命最核心的地方表现出来,吸收一点东西,在这个地方所吸收的东西才可以算是文化中的一点成绩,可以放在文化大海里占一席之地。”^①这些生命智慧经历了历史的沉淀和检验,其中不少东西在文化重建中产生了重要意义。比如《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史记》、《世说新语》、《沧浪诗话》、《红楼梦》、《古文观止》、《画语录》、《人间词话》等许许多多的经典文献,它与中华几千年的文化、文明血肉相连,认识和阐释这些文化典籍,有助于我们加深文化修养和艺术修养,培养我们的格调、趣味,提升我们的思想胸襟和精神境界。譬如石涛在《画语录·远尘章》中讲:“人为物蔽,则与尘交;人为物使,则心受劳。劳心于刻画而自毁,蔽尘于笔墨而自拘。此局隘人也,但损无益,终不快其心也。我则物随物蔽,尘随尘交,则心不劳,心不劳则有画矣。”他虽然讲的是绘画心境的一种酝酿和自由创作状态的如何生成,但是却已经远远超越了绘画的范畴,引导我们认识了他对物质世界对待向度的一种冷峻思考,彰显了石涛的超远精神品格。这些艺术心得和人生智慧,对于当下现实生活依然有其发掘、阐扬的意义和价值。拙著下编《中国文化诗学研究》中不少篇目,正是尝试着从中国传统文学、

① 牟宗三.生命的学问[M].台北:三民书局,1984.

诗学、文化中整理资源,发掘其新意义和价值,为建构本土化“中国文化诗学”提供一定的学理支持和资鉴。如《先秦两汉时期诗学人格批评论》一文,着重考索了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人格思想建构与批评、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人格思想建构与批评、屈骚文化人格思想建构与批评、“游侠”文化人格思想建构与批评,来把握它们的思想蕴涵、文化特质和精神品格。又如《试论汤显祖的戏曲批评思想》一文,爬梳、整理和研究了汤显祖的戏曲批评思想观念,并在此基础上作出重新阐释及评价,以激活其戏曲批评思想的话语功能,为勃兴的戏曲影视艺术批评提供理论武器和方法支持。通过考索,我们认识到根源于生命意志本真的“情本体”是汤显祖戏曲美学思想核心和批评标尺,汤显祖重“情”,强调作曲品曲首先应把握戏曲人物角色与“情”密切关联的内在生命精神、人格意志和人生意趣等,文辞、曲律是其次的。汤显祖以其在戏曲创作理论与表演实践方面的行动、表现回应了魏晋时期以来盛行的“言意之辩”“情文之辩”问题,涉及到戏曲文学本质、写作技巧及文学发生等诸多方面的思考和探索。汤显祖非常重视戏曲的社会功能,强调发挥艺术想象力,使戏曲作品具有生气,让人在审美愉悦的幻象世界中感化人心,改造人际关系,实现社会教化,改善社会秩序,最终创建出理想幸福的和平世界。

三

不管是中国艺术美学研究,还是中国文化诗学研究,必须重视具有民族特色的丰富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批评的文本资料,它是我们当下问题研究的资源宝库。

第一,有必要着眼“新问题”来研究、阐释历史文献材料。中国古代的诗话、词话、赋话、曲话、小说评点,文人往来书信、文集的序跋,专家专书、片断话语,古代书论、画论、乐论等中都有着大量的艺术美学、文化诗学思想,它们是中国文艺理论体系的重要构成,我们有必要对之进行爬梳、清理。宗白华先生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中也指出:“中国历史上,不但在哲学家的著作中有美学思想,而且在历代的著名的诗人、画家、戏剧家……所留下的诗文理论、绘画理论、戏剧理论、音乐理论、书法理论中,也包含有丰富的美学思想,而且往往是